

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

边燕杰 肖 阳

提要:本文运用 CGSS2008 和 TPS2008 的数据,对中英两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生命历程论、社会融合论、地位分化论三种理论视角,探讨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中英异同。数据分析主要结果是:(1)英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高于中国居民;(2)年龄和健康对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3)无论中国还是英国,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但是社会融合方式在中英之间存在显著差别;(4)地位分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强于英国。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生命历程 社会融合 地位分化 中英比较

幸福是人类终极价值之一,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幸福。思想者们希望找到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幸福体验。20 世纪中叶以来,这种探究进入经验科学领域,西方学者率先开展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既取得了共识,又保留着分歧(Diener,2000)。我国改革开放 35 年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你幸福吗?”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并已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邢占军,2011;刘军强等,2012)。

本文主要探讨中英两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我们选择中英比较视角,是遵循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念。从比较中认识自己、达到自觉是费先生“文化自觉”理念的要义(费宗惠、张荣华,2009)。基于此,我们试图借此项研究,从跨文化圈、跨经济体的分析中发现异同、审度自我、预知前景。根据英格哈特(Inglehart,1990)的长期观察和比较研究,中英是当代世界的文化大国,处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圈的核心:中国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行为上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结构上形成了“差序格局”;与此相对,英国是基督教文化圈的核心,行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社会资本与社会流动——中英两国的比较研究》(71071128)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机制研究》(11AZD02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陈皆明、李姚军、李黎明、张顺、张磊、匿名审评人和《社会学研究》责任编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为上是利益本位、个人导向,结构上形成了“团体格局”(费孝通,1985;梁漱溟,1987;边燕杰,2010)。中英还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的独特典型:中国目前是一个快速发展、正在转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而英国目前则是一个缓慢发展、体制稳定、具有一般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那么,宏观层次的文化圈差异和经济体差异在怎样程度上、以怎样方式影响两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于此,我们首先研讨相关文献,然后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最后用两国可比数据检验之。

一、文献综述

(一)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与测量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20世纪中叶兴起的幸福研究,以“快乐论”为导向,认为幸福是趋乐避苦的主观感受,所以称之为主观幸福感。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社会心理学家迪纳(Diener,2000)是少数公认的国际学术权威之一,他指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通过实际生活状态和理想生活状态的比较而产生的肯定态度和积极感受,其特点是主观性、积极性、综合性。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体现了迪纳关于上述三个特性的总结。为了体现主观性、积极性、综合性,早期研究者卡垂尔(Cantril,1966)曾采用图形形式,将主观幸福比喻为梯子或山脉,让受访者在图形中选择确定位置,代表该人的主观幸福感的高低程度。后来的研究者瞄准综合性特征,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由各种不同的生活感受综合而来,用一个图形或者一般化的问题根本测不准,所以建议使用“单项提问、总体相加”的方法,要求被访者回答生活质量的若干具体方面,经过加总获得主观幸福的综合感受,柯恩曼和库鲁格对此做了总结(Kahneman & Krueger,2006)。这种测量方法的调查成本较高,多用于心理调查、满意度调查等一些专业学术领域,缺乏广泛的适用性。最近,布洛(Blore et al., 2011)根据趋乐避苦的理论逻辑,挑战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性判断,从问题的反面入手,测量“去幸福感”,包括“痛苦”、“困扰”、“焦虑”等感受,为主观幸福感开辟了新的测量和分析视角。

自陈量表法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也是本文选用的中英两国可比数据所使用的方法。此方法直接询问人们的幸

福感觉,题器是:“考虑所有的因素,你觉得自己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太幸福、还是很幸福?”克鲁格和史卡德(Krueger & Schkade,2008)的研究表明,自陈量表法所产生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有效性、可比性。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2003)长期从事主观幸福感的国际比较,他认为自陈量表法数据是富有研究价值的,可以用来开展跨群体、跨文化、跨国别、跨体制的比较研究;目前,他和他的团队正在研究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问题(Easterlin et al.,2012)。

(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如果准确地测量主观幸福感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那么,穷尽主观幸福感的全部影响因素则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研究期待。这不但因为,人们的幸福感是主观的、综合的,为此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难以捕捉的;而且因为,个体之间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对幸福的体验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改观、社会的变迁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所以,个体之间的变异性是所有研究者探索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共同出发点,他们的差别是学科侧重不同,健康学侧重年龄、体质、疾病等身体指标,心理学侧重人格、心智、态度等心理指标,经济学侧重收入、分配、消费等经济指标,而社会学则侧重群体归属、地位分层、排斥融合等社会指标。

健康和心理研究表明,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青年人和老年人比中年人更幸福(Diener,2000)。究竟年龄—幸福曲线的拐点发生在哪个年龄段?这是数据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实证问题(Smyth et al.,2008)。总的说,拐点发生的越早,中年群体中不幸福的人数越多、不幸福的时间越长,社会改造的任务越大(George & Landerman,1984)。研究还表明,良好的身心健康将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Dolan et al.,2008)。反之,身患疾病、心情不佳、性格偏执将导致精神痛苦、自评颇低、极度困惑等症状,产生持续不幸福的感受(Anderson,2014)。这些来自西方的实证发现在中国也得到了验证(邢占军,2011;刘军强等,2012;Steele & Lynch,2013;Bian et al.,2014)。

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围绕收入增加是否增进幸福的问题展开,最有影响的是关于收入—幸福关系的“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争鸣和实证分析。按照经济理性假设,个人收入的增加必将提高人们的满意度,从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虽然早期数据证明了这一关系,但是二战以来美国人均收入虽然有了显著增加,所观测的幸福感水平并未发现相应的提

升(Easterlin,1974)。当研究视域拓展到发达国家之后,学者们发现,居民收入与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虽然统计显著,但是相当微小(Diener & Diener,199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该系数不但统计显著,且很高(Hayo,2003)。基于有限数据的分析,伊斯特林及其团队在中国发达地区也发现了类似趋势(Easterlin et al.,2012),虽然其他数据表明,中国总的情况是收入的增加将提高主观幸福感(王鹏,2011;刘军强等,2012),特别是在农村地区(Knight et al.,2009)。

如何理解“伊斯特林悖论”?换句话说,为什么收入—幸福的关联性在发达地区消失了?相对收入理论认为,既然主观幸福感是现实与理想的比较结果,那么,它必定是人们相对收入的结果(Clark et al.,2008)。所谓相对收入,就是个人的收入与过去收入相比、与参考群体的平均收入相比,产生收入不变、提高、降低等三种相对变化的情况。在经济发展时期,由于贫穷落后地区的相对收入提高显著,所以收入的增加显著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水平;但在富裕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收入提高缓慢,甚至停滞,所以形式收入的增加不会增进人们的主观幸福。这一理论要求历史追踪数据,较难收集,所以,实证分析、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跨国比较分析,还处于初级研究阶段(Easterlin et al.,2012)。

在社会学界,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研究课题。根据韦胡文(Veenhoven,2008)的总结,争议的一端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如何根据客观条件而变化的科学,主观幸福属于心理学范畴,不属于社会学,至少不是重点研究问题。争议的另一端则认为,主观幸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既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以社会学者必须加强主观幸福的研究。事实上,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指标研究,由社会学者主导,从一开始就包括了主观幸福的内容,并就群体归属、地位分化、社会融合、社会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Diener,2000)。社会学研究表明,性别角色、婚姻关系、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就业状态、阶级阶层归属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Veenhoven,1991;Clark & Oswald,1994;Chou,1999;Blancherflower & Oswald,2004;Dolan et al.,2008)。

(三)主观幸福感的跨国比较

主观幸福感的跨国比较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指出,幸福对每个人都是相对的,一国财富的多少并

不会对国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他的实证结果表明,“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幸福感水平是相同的”。这一结论激起了研究者们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在国际比较上的研究兴趣。这些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展开的,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居民购买力等作为衡量不同国家财富的标准,主观幸福感水平则是特定国家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平均值。英格哈特(Inglehart,1990)发现,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是呈现正相关关系的。韦胡文(Veenhoven,1991)指出,不存在相对、变动的幸福标准,人们的幸福感受是以基本需求为标准的,这一基本需求在各国是统一的。韦胡文对盖洛普197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各国的人均GNP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达0.84。斯蒂文森和沃夫斯(Stevenson & Wofers,2008)分析了近100个国家的数据,也发现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赫立维尔(Helliwell,2002,2007)的多国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通常拥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有效的民主运作制度,所以收入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些制度的完善而发挥作用的。

除了经济层面,国家和族群的主导文化价值也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与法国人相比,美国人更倾向于说自己是快乐的,因为美国人认为快乐是积极的,是件好事,而法国人则认为“快乐的人是傻瓜”(Diener & Diener,1995)。美国学者对国内不同族群也做了比较研究,发现个人享乐目标的实现能让欧裔美国人体验到积极的情感,而亚裔美国人却不能获得相同的体验;与此相反,亲朋快乐目标的实现往往让亚裔美国人体会到积极的情感满足,而欧裔美国人却得不到相同的满足(Oishi & Diener,2001)。美国学者斯蒂尔和林池(Steele & Lynch,2013)还分析了中国的历史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主义文化价值上升,集体主义文化价值下降,使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集体主义导向的幸福感正在走向个人主义导向的幸福感。这是否预示着中西方幸福观将走向趋同呢?

二、理论观点与研究假设

我们带着上述问题开展此项中英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文献综述告诉我们,跨国比较首先需要发掘一般影响因素,摸索

出主观幸福感变化的普遍规律性。

我们认为,无论生活在中国还是英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人们有着共同的生命历程,从出生到青年、再到成年、最后进入老年,人生角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身心健康状况也随之变化,所以年龄和健康影响着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这是大量实证研究所显示的普遍规律性(Diener, 2000)。为此,我们将从“生命历程论”观点出发,提出研究假设,用以指导中英主观幸福感的相似性的数据分析。诚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中英两国之间,无论是在文化价值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都存在重大的差别。如何分解两国之间的这些宏观差异,并在个人层次上测量它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本研究的难点,也是学术创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从社会学立场出发,将幸福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由此提出两个理论观点,指导我们对中英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的考察,以期抛砖引玉。一个观点出自“社会融合论”,即我们假定,中英两国之间的差异在于其居民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各自的社会。基此,我们的研究着眼于个人对于社会的融入程度:融入了则幸福,融入的浅则较幸福,融入的深则很幸福,融入不了则不幸福。另一个观点出自“地位分化论”,这方面,中英之间是程度的差异:根据“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逻辑,地位资源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强于发达国家的英国。于此,我们的研究着眼于个人占有地位资源的多寡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地位资源多则较幸福,地位资源少则较不幸福。

下面,我们分别阐述上述三个理论观点,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生命历程论

生命历程论(Life Course Approach)的提出者埃尔德(Elder, 1979)认为,持续发生的社会和文化事件是人生过程的大背景,人们不断调整其角色,以适应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基此立场,他认为,年龄已经从本来的身心发展和健康的生物学意义拓展出来,被赋予时代(Period)、同期群(Cohort)、社会成熟(Social Mutuality)等丰富的社会学涵义。为此,他倡导将人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吸收到生命历程的概念中来,给年龄赋予最新的社会学解释,从而建构了生命历程论的最初理论框架(参见李强等,1999;包蕾萍,2005)。于此理论框架中,年龄所表达的是一种社会期望,这种期望是社会对个体发展方向的一种规定。

从生命历程论的基本逻辑出发,我们认为,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产生不同的社会期望;这些不同的社会期望对于个体造成不同的压力、形成不同的激励,影响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例如,青年人处在求学阶段,或者刚刚步入社会,对未来的发展空间抱有很大期望,主观幸福感较高;中年人则要承当家庭和社会各种角色,行为责任和心理压力较重,主观幸福感较低;老年人大多回归家庭,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并且由于经历了多年的生活磨砺,在面临各方面的压力时,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应对,主观幸福感将会上升。

身心健康是与年龄直接相关的生命历程指标。人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年龄一样,伴随着生命历程而发生变化,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和强弱。例如,疾病之躯限制人的行动,引发心理痛苦和困扰;亚健康状态增加各种不方便,或者令人情绪低迷和消沉,或者限制正常的社会交往,引发“力不从心”的失望和无奈情绪;健康体态则令人精神振奋,行为活跃,敢于迎接人生挑战和社会竞争,从而获取社会回报,增强和提高主观幸福感。由此,我们提出生命历程的1个总假设和2个子假设,以适用于中英两国之比较:

假设1: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受年龄和健康的影响。

具体地说:

假设1a: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中年人低于青年人和老年人;

假设1b:人们的健康状况越好,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二) 社会融合论

所谓社会融合,指的是个人对于社会机体的融入。具体地说,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被周围他人、被社会团体、被正式组织所认可、接受、容纳?这就是社会融合问题。社会融合问题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护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人们幸福不幸福,社会融合是个重要的视角,社会学者应当从这个视角研究主观幸福感的问题。

在社会学发展史中,关于社会融合问题的论述最早出现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中(Durkheim, 1951)。涂尔干认为,个人只有得到社会群体有效和适度的支持,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社会支持的功能,对于群体而言,形成了社会凝聚力,达到了社会整合;对于个体而言,实现了社会融合,体现在个人的宗教归属、家庭亲和、政治团结等方面。在涂尔干看来,在微观层次上,没有融入社会的个体将失去生活

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所以导致自杀行为;在宏观层次上,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越低,自杀率越高;反之,社会的整合程度越高,自杀率越低。在涂尔干的影响下,社会融合成为现代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概念之一,是社区发展、族群关系、移民同化等研究的主导理论框架(Alba & Nee, 1997)。根据这个框架我们推论,个体越是融入于社会,越感到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越强。

中英居民实现社会融合的渠道是一致的吗?进一步说,某种社会融合渠道在中英两国之间提供等价的社会支持功能吗?我们的答案是:不尽然。在中英可比数据中我们发现4个相关变量,可以代表4种不同的社会融合渠道,下面我们一一阐述每个变量所预示的社会融合功能的中英异同。

一是婚姻,代表情感归宿融合。融合程度已婚者高于未婚者。这一判断虽然符合中英两国的经验,但是中英差异需要深入分析才能把握。婚姻所以成为社会融合的渠道,从比较婚姻研究看来,是因为婚姻生活为在婚者提供了情感支持(Xu, 1996)。具体地说,配偶成为日常生活的依赖,连接亲朋的桥梁、充分交流的朋友、敞开心扉的知己,这些都成为个人化解郁闷、减少痛苦、消除矛盾的亲情机制。怎样的婚姻能更好地提供这些情感支持、发挥融合功能?是自由恋爱的婚姻,而不是听命于他人安排的婚姻;是自主自裁的婚姻,而不是勉强凑合的婚姻;是保护相对自我空间的婚姻,而不是压抑个性、否定自我的婚姻。一句话,是质量高的婚姻,而不是质量低的婚姻。婚姻质量研究表明,质量高的婚姻,城市社区多于农村社区,发达国家多于欠发达国家,开放社会多于封闭社会(Allendorf & Ghimire, 2012),英国多于中国(Xu, 1996; Blancherflower & Oswald, 2004)。为此,婚姻作为情感归宿融合的社会机制,从而提高在婚者的主观幸福感,其影响程度英国高于中国。

二是就业状况,代表职业归属融合。就业还是失业,这是个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渠道和指标(Alba & Nee, 1997)。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在业者被社会容纳、失业者被社会排斥,在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即高于失业者。虽然这一判断适合中英社会,但它的影响效果依据不同社会的相关制度而发生变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职业、特别是具有“五险一金”的正式稳定职业,对于人们是否感到被社会所容纳至关重要。英国是一个发达国家,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社会保障福利与人们的就业状态相对独立,减低了就业与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程度。为此,就业状况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中国高于英国。

三是宗教,代表精神慰藉融合。信徒心感上帝,互相之间亲如兄弟姐妹,依此宗教认同及其精神慰藉,提高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我们认为,宗教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英国远远高于中国。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宗教传统较长,特别是统一宗教的传统较长,宗教信仰相对独立,为世俗活动寻找意义,从而会增强个体生活的充实感、生命力、幸福感(Diener,2000)。这符合英国的情况:天主教和基督教在英伦三岛早已深入人心。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我国,宗教信仰是多元的,往往被世俗化,人们从实际生活出发选择是否认同宗教,认同什么宗教(杨凤岗、杨江华,2008)。为此,宗教认同在中国失去了独立的精神慰藉的功能,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大大降低了。

四是社会资本,代表人际交往融合。社会资本较多者,其人际融合程度也较高。这方面,中英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在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中,个人主要通过非正式网络获取社会支持资源(李树苗等,2008);在英国的“团体格局”社会中,个人主要通过正式网络获取社会支持资源(Alwin et al.,1985)。中英社会网络比较的最新实证结果也发现并验证了这一点(边燕杰、郝明松,2013)。所谓正式网络,是指通过兴趣团体、非政府组织、工作组织等机构建立的组织化网络;而所谓非正式网络,则是指通过亲朋好友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本文获得的中英可比数据是后者(非正式网络)而不是前者。所以,虽然以人际交往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在中英两国都发挥社会融合作用,从而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其作用程度,中国高于英国。

藉此,根据社会融合论的分析,我们提出1个总假设和4个子假设:

假设2:个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具体地说:

假设2a:婚姻状况影响主观幸福感,其程度英国高于中国;

假设2b:就业状况影响主观幸福感,其程度中国高于英国;

假设2c:宗教认同影响主观幸福感,其程度英国高于中国;

假设2d:社会资本影响主观幸福感,其程度中国高于英国。

(三)地位分化论

社会分化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分化可表现为:或者由于人们的社

会角色差异、结构归属差异所引起的类别分化、群体分化,或者由于人们的职务职位、身份等级、资源支配权力的差异所形成的垂直分化、地位分化。本文关心的是后一种,通称为地位分化。我们的问题是,地位分化如何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理性人假设出发。特纳(2001/1991)认为,理性个体通过追求更多的资源来获取自己利益的满足。在一个地位分化的社会里,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处在高地位阶层的个体得到的优势资源多,而处在低地位阶层的个体得到的优势资源少。缺少优势资源,个体的利益满足感就无从谈起,主观幸福水平就低。另外,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个体通常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塑造自己的主观幸福感水平(Clark et al., 2008)。在与低地位阶层相比的过程中,高地位阶层者会因拥有优势资源而觉得幸福,而地位较低的阶层者则会在比较中因缺乏优势资源而痛苦。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从中英可比数据中选择了4个地位变量以讨论中英异同。

一是性别。知名女权主义者费尔斯通认为(费乐斯通,2005/2001),性别之所以成为地位指标,是由于性别角色的传统文化符号,嵌入于婚姻、家庭、学校、职场、政治等领域,形成重男轻女的偏见和歧视,是一种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等级范例。中英之间,中国的性别地位涵义尤甚。研究发现,人的社会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两大制度体系,保持、传播、强化着性别地位差异(佟新,2010),使我国女性无论在教育、就业还是收入等方面都承受着歧视(佟新、梁萌,2006;李春玲、李实,2008;童梅,2012)。戴维斯和罗宾逊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虽然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种种问题,但是二战以来,通过女权运动、反歧视法的实施、机会平等理念的广泛传播,公开和恶意的性别歧视缺乏公众支持,性别地位观受到很大抑制(Davis & Robinson, 1991)。为此,性别地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高于英国。

二是教育。教育程度的地位资源涵义在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Blau & Duncan, 1967)。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高,资源支配权力越大,主观幸福感就越强。中英之间,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哪个国家更大?我们没有可借鉴的前期研究。从“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逻辑出发,国家财富增加对于个体的相对资源影响,发达国家应大大小于发展中国家。由此推论,我们判定,教育程度作为地位资

源变量,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中国高于英国。

三是收入。市场经济社会,收入是地位资源最为直接的指标。理性经济人假设告诉我们,较高的收入将使个体获得较多的利益满足,所以会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伊斯特林悖论”指出,这一规律是有条件的:进入发达国家之后,全社会的平均收入的增加,不会显著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中国的发达地区也不例外(Easterlin et al., 2012)。英国是发达国家,人均 GDP 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整体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英国。所以,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显著大于英国。

四是职业。职业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分层指标,它所体现的地位差别,究竟表明职业之间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寡,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这一直是跨国比较分析的研究课题(Ganzeboom & Treiman, 2003)。在保持中英之间职业地位指标的可比性的前提下,本文关心职业地位是否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中英是否存在差别?从社会经济资源的理论视角看,职业地位越高,在职者所能使用的社会经济资源越多,支配者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根据“伊斯特林悖论”的逻辑,这种效应在发展中的中国强于发达的英国。从权力支配关系的理论视角看,职业地位越高,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越大,支配者的主观幸福感则会越高。由于官本位体制和文化的作用,这种效应中国高于英国。

鉴此,根据地位分化论的分析,我们提出 1 个总假设和 4 个子假设:

假设 3: 社会地位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

具体地说:

假设 3a: 男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女性,此效应中国高于英国;

假设 3b: 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此效应中国强于英国;

假设 3c: 收入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此效应中国强于英国;

假设 3d: 职业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此效应中国强于英国。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 2008 年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和英国 2008 年休闲、文化与体育调查(TPS2008)。两个数据是同年的,都是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为了满足可比性要求,我们选择 18 - 87

岁的年龄段作为分析样本。中国样本共 5824 名被访者,平均年龄 43 岁多,男性占 49% 强;英国样本共 19441 名被访者,平均年龄 48 岁多,男性接近 44%。中英变量的均值、百分比、两国差异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平均值、百分比、中英差异

变量	中国	英国	中—英
主观幸福感			
均值(1-5)	3.71	4.07	- .36
1 很不快乐(%)	2.33	1.45	2.19
2 不太快乐(%)	9.19	4.78	4.41
3 普通(%)	24.38	17.40	6.98
4 还算快乐(%)	43.03	45.86	-2.83
5 很快乐(%)	21.07	30.51	-9.44
生命历程			
平均年龄(18-87岁)	43.11	48.18	-5.07
平均自评健康(1-5)	3.68	3.93	- .25
社会融合			
已婚比例(%)	83.16	55.38	27.78
就业比例(%)	67.22	56.33	10.89
离退休比例(%)	11.61	24.27	-12.66
料理家务比例(%)	9.27	7.37	1.90
在学比例(%)	2.47	2.17	- .30
无业比例(%)	9.43	9.86	- .43
宗教信仰比例(%)	9.24	76.58	-67.34
平均社会资本(1-100)	17.93	33.35	-15.42
地位分化			
男性比例(%)	49.14	43.91	5.23
初等教育比例(%)	61.38	45.54	15.84
中等教育比例(%)	23.25	19.57	3.68
高等教育比例(%)	15.37	34.89	-19.52
平均收入水平	13518.94 元	19626.84 镑	
收入水平标准差	30938.34 元	15368.09 镑	
高层职业比例(%)	12.50	31.66	-19.16
中层职业比例(%)	19.47	33.31	-13.84
低层职业比例(%)	68.03	35.03	33.00
样本数	5824	19441	- 13617

(一) 主观幸福感指标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其生活状态的评价,这种评价可以是具体的,特指生活中的某一方面;也可以是总体的,泛指生活的全部。中英数据都采取了单项总体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但是中国选项为5个等级:“很快乐、还算快乐、普通、不太快乐、很不快乐”;英国选项为10个等级:“1代表很不快乐,……,10代表很快乐”。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英国数据的10个等级合并为5个等级,具体是1和2合并为1,代表“很不快乐”,3和4合并为2代表“不太快乐”,以此类推,直至9和10合并为5,代表“很快乐”。表1显示,平均主观幸福感中国(3.71)低于英国(4.07),中英差异是统计显著的($t = -28.64, p < 0.01$)。中英差异虽在5个不同等级上均有体现,但主要是“还算快乐”和“很快乐”2项,英国的比例大大高于中国。必须承认,就平均水平来说,英国人比中国人更感到幸福。

(二) 生命历程指标

年龄指标,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是18岁和87岁,中英一致,但是英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平均年龄也高于中国。健康指标,中英数据都采取了国际卫生组织使用的标准自评健康量表,是一个5等级的连续变量,英国的平均自评健康优于中国。这两项指标表明,英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英国的老年人口比例比中国高,总体健康状况也比中国好。

(三) 社会融合指标

社会融合指标涉及4个变量。婚姻状况是一个哑变量,2个类别分别是已婚和未婚/离异/丧偶,中国的已婚比例大大高于英国。

就业状况是一个定类变量,包括5个类别:就业比例中国高于英国约11%,离退休比例英国高于中国约13%,料理家务、从未工作的比例中国高于英国约2%,在学和无业比例中英非常接近。我们的研究重点是比较在业者和无业者的差异。宗教认同是一个哑变量,2个类别分别是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中国的信教人口不足10%,相当于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而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是信教者(Bian et al., 2014);而英国的信教人口接近77%,占绝对多数。

社会资本是一个连续变量,中英数据都是基于“定位法”从个人交

往网络计算而来,反映的是交往人的职业类别和职业声望,取因子值,具体方法请见引文(边燕杰、李煜,2000;Li et al.,2008)。为了方便分析和中英比较,我们将因子值转化为1个百分值,中英最低都是1分、最高都是100分。表1显示,中国居民的社会资本平均得分大大低于英国。这说明,英国人的平均交往面较宽,倾向于格兰诺维特说的“弱关系网络”(Granovetter,1973);而中国人的平均交往面较窄,倾向于边燕杰说的“强关系网络”(Bian,1997;边燕杰,2010)。

(四)地位分化指标

中英数据库包含了大量的地位分化指标,本文根据理论需要选择了性别、教育、收入、职业4个指标。性别是哑变量,男性和女性2组,中国样本的男性比例接近50%,高于英国。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为了方便中英比较,分为3个等级:初中及以下为初等,高中、技校、中专为中等,大专及以上为高等。表1显示,虽然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中英相近,但是初等、高等2组所占比例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严重落后于英国。收入是一个连续变量,中国的平均收入为1.35万元人民币,英国接近2万英镑,约合26万人民币,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于英国,即使按可比价格计算消费水平,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但是,中国的收入标准差却大大高于英国。用标准差除以平均数得到“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表示不平等程度,中国是2.32,而英国是0.78。根据这个系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英国的3倍!职业地位分为高、中、低3个层次。为了保证中英可比性,高位职业包括高级管理、高级专业技术、大企业主,中国约13%,英国约32%;中位职业包括小企业主(个体户)、一般专业技术、办事人员,中国约20%,英国超过33%;低位职业包括所有体力劳动者,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和农民工(25%),所以比例高达68%,英国的体力劳动者只有35%。我们的研究兴趣不在于职业分层,而在于居于高、中、低3层的中英在职业者,他们主观幸福感的相对水平如何。

四、模型分析结果

表2报告了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的分析结果。第1

表 2 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定序逻辑回归分析

变量	中国	英国	中英差异检验
生命历程论			
年龄	-.112 ***	-.043 ***	.078 ***
年龄平方	.001 ***	.001 ***	-.001 ***
自评健康	.454 ***	.635 ***	.135 ***
社会融合论			
婚姻(已婚=1)	.522 ***	.839 ***	.266 **
就业状况(无业为参照)			
就业	.417 ***	.240 ***	-.207 *
离退休	.583 ***	.592 ***	-.039
在学	.744 ***	.233 *	-.563 *
料理家务	.382 ***	.074	-.331 *
信仰宗教(有=1)	.097	.169 ***	.084 ***
社会资本	.011 ***	.005 ***	-.007 ***
地位分化论			
性别(男性=1)	-.195 ***	-.053	.157 **
教育程度(低等为参照)			
中等	.133 *	-.046	-.187 *
高等	.296 ***	-.127 ***	-.444 ***
收入/10000	.039 **	.001	-.041 *
(收入/10000)平方	-.001 *	8.93e-07	.001 *
职业阶层(底层为参照)			
中层	.197 **	-.149 ***	-.360 ***
高层	.236 **	-.067	-.320 ***
阈值			
1	-3.347	-2.101	-3.290
2	-1.577	-.659	-1.719
3	.011	1.117	-.016
4	2.100	3.463	2.268
卡方值	787.30 ***	2985.21 ***	4475.52 ***
样本数	5824	19441	25265

注: * p<0.05, ** p<0.01, *** p<0.001;中英合并数据中,国家变量的参照类别为中国。

列结果是中国的回归系数值,第2列结果是英国的回归系数值。这些是分别分析中英数据所得到的结果。第3列是各系数值中英差异的显

著水平的统计检验结果。根据一般规则(参见吴愈晓,2010),我们将中英数据合并重新分析,获得各变量的“主效应”和这些变量与国家哑变量的“交互效应”的系数结果。交互效应的统计意义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各因素(即变量)在中英之间是否确有差异?如果有,差异究竟有多大?为了节省空间,表2省略了主效应的系数值,只列出交互效应的系数值。下面,我们按照三个理论观点分别叙述表2结果。

(一) 生命历程论

表2显示,年龄系数是正向的,年龄平方的系数是负向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两个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这说明,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英都是U型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主观幸福感降低,而过了中年的某个拐点之后,主观幸福感开始上升。

自评健康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英都是正向的,说明无论中国还是英国,身心越健康,幸福感越强。这两项数据分析结果,分别支持研究假设1a、1b。第3列数据结果表明,年龄和健康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英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年龄的影响效应,中国显著地高于英国;而健康的影响效应,英国显著地高于中国。

(二) 社会融合论

总的说,表2数据支持社会融合论假设。

首先,无论中国还是英国,婚姻关系提升在婚者的主观幸福感,此效应英国显著地高于中国,支持假设2a。

其次,在中国,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非就业者,此效应中国高于英国,支持假设2b。无论中英,离退休者和在学学生比无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也高;但是,料理家务者,在中国比无业者的幸福感高,而在英国与无业者相同。

再次,宗教信仰在中国与主观幸福感没有关系,而在英国则显著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支持假设2c。^①

最后,无论中国还是英国,社会资本越多,主观幸福感越高,其效应中国显著地高于英国,支持假设2d。

^① 在中英合并数据中,国家和宗教的相关系数极高,模型只容许进入国家—宗教互动变量。

(三)地位分化论

表 2 数据结果比地位分化论假设所预测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性别的地位分化作用,中国存在而英国不存在,但是中国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与假设 3a 相悖。这可能由于,虽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成功,但是社会对男女角色的定位不同、标准不一,女性低于男性,比男性更容易满足,而男性往往雄心勃勃,容易压抑自我。

其次,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英之间具有截然不同的趋势,也是统计显著的。具体来说,在中国,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支持假设 3b;在英国,教育程度越低,主观幸福感越高,这是事先没有预测到的。英国的高教人群类似中国的男性,期望高,满足难,幸福感低。

再次,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国存在且效应很大,英国则完全不存在,支持假设 3c。

最后,在中国,职业地位较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也较高,部分支持假设 3d;在英国,中层职业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高层和低层职业,高、低之间没有差别,这和假设 3d 不相吻合。

五、结论与讨论

中英比较研究表明,英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高于中国居民。由于中英都采取 5 点测量,中英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感到幸福的人口比例,英国大大高于中国;而感到不幸福的人口比例,中国大大高于英国。

与中国相比,英国居民保持较高幸福感,主要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健康水平较高。我们的模型结果表明,健康与否是英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所以,较高的健康水平使较多的英国人感到幸福。二是婚姻关系的作用。虽然在婚者的比例英国刚刚超过一半,比中国低得多,但是婚姻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比中国高得多。这就保证了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水平。三是宗教认同。这是一个影响极大、效应极强、作用极稳的因素。英国的信教者占人口的 3/4 强,普遍的宗教认同确保了绝大多数的英国人稳定、持续地感到幸福。

与英国相比,除了宗教认同之外,健康和婚姻也是影响我国人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费先生“文化自觉”理念的要义是从差异比较中认识自我、达到自觉。从这一理论立场出发,我国人民的主观幸福,整体结构明显有别于英国。藉此,我们讨论几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第一,在我国,年龄和性别的影响颇大,中年人和男性的相对幸福较低,而这两部分人群的比例不但很大,并且是经济活动人口的主力。如何提高中年人和男性的相对幸福水平?这是重要的研究任务。

第二,与英国相比,我国人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极强的工具理性倾向。这表现在:主观幸福水平,就业者大大高于无业者,教育程度较高人口大大高于教育程度较低人口,收入较高者大大高于收入水平较低者,职业地位较高者大大高于职业地位居中和偏低者。这些影响在英国是不存在的。这些影响的本质,是资源满足欲望而致主观幸福。这是工具理性逻辑。用这个逻辑来看中国中年人和男性,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相对幸福水平为什么较低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就是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所以,要提高我国广大人民的主观幸福感,必须深化改革,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保持和提高就业水平,持续增加收入,并且将收入不平等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第三,与英国相比,我国人民的主观幸福感,受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质量的影响更大,其影响程度的差异,中国是英国的1倍。这表明,为了保持我国广大人民的主观幸福感,必须深化改革,加强社会治理,特别是社会关系的治理。从数据上看,我国居民的人际社会交往有“强关系”倾向,所以社会资本的质量比英国还低。如果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使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拓宽人际关系网络,增加兴趣团体网络,提高社会参与网络,像英国人民一样发展“弱关系”的交往网络,社会资本的质量就会提高,主观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

在我们的此项比较研究中,有几项对英国的实证发现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主观幸福感没有性别差异,二是就业状况的影响没有中国高,三是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是负向的,四是中层职业地位的主观幸福感低于高层和底层。这几项发现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对此,我们的思考是,必须从社会保障体系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英国是一个国民福利较高的国家,虽然没有达到北欧国家的水平,但是也保持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特征,其社会保障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英国公

民是社会发展的实际享受者,不分性别、不论就业与否、不考虑教育程度或收入水平、与职业地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联。当然,这是我们的揣测,尚需要深入研究,用实证数据验证之。但是,在这里,为什么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是负向的呢?解决这一悬念,也是未来跨国比较分析的任务。

参考文献:

- 包蕾萍,2005,《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边燕杰,2010,《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边燕杰、郝明松,2013,《二重社会网络及其分布的双重比较》,《社会学研究》第2期。
- 边燕杰、李焯,2000,《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辑,厦门:鹭江出版社。
- 费尔斯通,2005/2001,《性别的辩证法》,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王俊、刘能、张传良、王水雄、何慧丽、梁茂春、李国武、孙龙、胡杰言、杨渝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费宗惠、张荣华编,2009,《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人民出版社。
- 李春玲、李实,2008,《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强、邓建伟、晓箐,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费尔德曼,2008,《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经济》第2期。
- 梁漱溟,1987,《中国文化要义》,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2012,《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特纳,乔纳森,2001/1991,《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册),周艳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童梅,2012,《社会网络与女性职业性别隔离》,《社会学研究》第4期。
- 佟新,2010,《劳动力市场、性别和社会分层》,《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佟新、梁萌,2006,《女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研究》,《妇女研究论丛》增刊。
- 王鹏,2011,《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吴愈晓,2010,《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社会》第6期。
- 邢占军,2011,《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杨凤岗、杨江华,2008,《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Alba, Richard & Victor Nee 1997,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 Allendorf, Keera & Dirgha Ghimire 2012, "Determinants of Marital Quality in an Arranged Marriage Society."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Research Repor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Alwin, D. F., P. E. Converse & S. S. Martin 1985,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
- Anderson, R. E. 2014, *Human Suffering and Quality of Life Conceptualizing Stories and Statistics*.

- New York:Springer.
- Bian, Y., L. Zhang, J. Yang, X. Guo & M. Lei 2014,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People: A Multifaceted View."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forthcoming).
-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 Blancherflower, David G. & Andrew J. Oswald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8.
- Blau, P. & O.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lore, J. D., M. A. Stokes, D. Mellor, L. Firth & R. A. Cummins 2011, "Comparing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to Affective Mod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0.
- Cantril, Hadley 1966,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 Newar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Chou, Kee-Lee 1999,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0(3).
- Clark, A. E. & A. J. Oswald 1994,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s Journal* 104.
- Clark, A. E., P. Frijters & M. A. Shields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
- Davis, N. & R. Robinson 1991, "Men's and Women's Consciousness of Gender Inequality: Austria, West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 Diener, E. & C. Diener 1995,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visited: Income and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6.
- Diener, E. D.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 Diener, E. D., E. Seidlitz & M. A. Okun 199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or Absolut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8.
- Dolan, P., T. Peasgood & M. White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
- Durkheim, E. 1951, *Suicide*. London: Routledge.
- Easterlin, Richard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 David & M.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2003,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19).
- Easterlin, R. A., R. Morgan, M. Switek & F. Wang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 – 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
- Elder, Glen H., Jr. 1979,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
- Ganzeboom, Harry & Donald Treiman 2003, "Three Internationally Standardised Measures for

-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Occupational Status. " In Jürgen Hoffmeyer-Zlotnik & Christof Wolf (eds.), *Advances i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ress.
- George, L. K. & R. Landerman 1984, "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Replicate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
- Granovetter, M. 1973, "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Hayo, B. 2003, " Happiness in Eastern Europe. " Paper Presented at 5th Conference ISQOLS, Frankfurt, Germany.
- Helliwell, John F. 2002, "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065.
- 2007, " Well-being and Social Capital; Does Suicide Pose a Puzzle?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1.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hneman, Daniel & Alan Krueger 2006, "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 - Being.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
- Knight, John, Lina Song & Ramani Gunatilaka 2009, "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
- Krueger, Alan B. & David A. Schkade 2008, " The Reliabilit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Measures.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8-9).
- Li, Yaojun, Mike Savage & Alan Warde 2008, "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9.
- Oishi, S. & Diener E. D. 2001, " Goals,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 Smyth, R. , V. Mishra & X. Qian 2008, " The Environment and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 " *Ecological Economics* 68.
- Steele, L. G. & S. M. Lynch 2013, "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China: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dur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4.
- Stevenson, B. & J. Wothers 2008, "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 *B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9(1).
- Veenhoven, Ruut 1991, " Is Happiness Relative?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1).
- 2008, "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 In Michael Eid & Randy Larsen (eds.),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 Tribute to Ed Diener*.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 Xu, Xiaoho 1996, " The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Conceptualizing and Predicting Marital Quality of Ever-Married Women in Urban America and China; Detroit and Chengdu.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26(2).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张宛丽

PAPER

Family Involvement, Firm Siz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 *Li Lulu & Zhu Bin* 1

Abstract: Lots of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on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the results are contradictory.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se studies ignore firm’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s such as firm size, 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firm performance, since agency cost and resource superiority of family firms vary based on firm siz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differentiates family involvement into two aspects, which are family control and family intentions. Using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survey data in China,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family involvement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effects are weaken as firms expand in scal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and Britain
..... *Bian Yanjie & Xiao Yang* 22

Abstract: Based on the CGSS2008 and TPS2008 dataset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British people’s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and the results are interpreted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life cours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tatus differenti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average SWB is higher in Britain than in China; (2) people’s age and health conditions affect their SWB in both China and Britain; (3) people who are highly integrated into society tend to have higher SWB, but religion and employment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SWB in China and Britain; and (4) socioeconomic statuses increase people’s SWB, but such effect exists in China and not in Britain.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Value of Consumption in Transnational Spaces:
Fuzhou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 *Li Xiangyi & Zhou Min* 43